

第二十七辑

老照片

雷震与《自由中国》 范泓
一篇文章与一个农民 卢跃刚
张申府与刘清扬 孟东
梅志的故事 闻敏
老人与老桥 朱成鹏
70年前的国立青岛大学 散木
“铭贤学校”今犹在 聂永正

山东画报出版社





西装革履的鼓手(20世纪40年代摄于长春)

林吉 供稿



BROVIRA No. 112a

博羅維那紙

矮克發 白色丰光絨面

人像摄影(摄于 20 世纪 20 年代)

韩英 供稿

目 录

范 泓	雷震与《自由中国》	1
-----	-----------------	---

在大陆，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台湾，雷震这个名字却家喻户晓。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来的……

邵 建	《自由中国》的两个“容忍与自由”	17
-----	------------------------	----

容忍从来都是双方的事，不仅针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同时也针对主持言论的人……

卢跃刚	一篇文章与一个农民	32
-----	-----------------	----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人自古提倡的美德，而事实上真正这样做的人却往往命运多舛。一位农民思想家的不幸遭遇，再次警示我们应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来自民间的智慧……

孟 东	张申府与刘清扬	42
-----	---------------	----

闻 敏	梅志的故事	60
-----	-------------	----

中国女人的命运往往系于自己的丈夫，身为胡风的妻子，她经受了太多的“洗礼”，也因此变得更为刚强……

俞 虎	张霖之二三事	74
-----	--------------	----

朱成鹏	老人与老桥	80
-----	-------------	----

1937 年竣工的钱塘江大桥，是中国建桥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篇讲述了两位老人与这座大桥的不解之缘。随文刊出的珍贵照片，再现了当年的施工现场……

曹立先	往事忆先人	91
-----	-------------	----

散 木	70 年前的国立青岛大学	100
-----	--------------------	-----

老照片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的青岛大学可谓群贤毕至，名师云集，于今想来，仍让人心向往之……

聂永正	“铭贤学校”今犹在	109
徐维新	最后的厘卡	115

牛 畅	“太行山牌”提琴诞生记	119
邵长波	照相	124
张玉洪	难报三春晖	128
孙嘉瑞	苦涩岁月	132
王树范	军校模范班	138

《老照片》丛书	史耀增	60年代的影迷	140
	星兴典	美姿容的豫剧“皇后”	144
	述 弢	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	146

主 编

刘瑞琳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 涛

郭小聪	历史的证词	157
冯克力	善待“民间智慧”	157

封二 西装革履的鼓手（林吉） 中插 1880年：
墙里墙外（方霖） 封三 人像摄影（韩英）
1950年的工友合影（王永吉 123） “国军”女兵的
合影（王放 139）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多维视焦·

雷震与《自由中国》

范泓



图① 1939年，作为蒋介石的政治幕僚，雷震出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折冲于各党派之间。

雷震这个人，实在是一位值得追念的历史人物。

在大陆，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雷震这个名字却家喻户晓。雷震原本国民党高层核心人士，蒋介石的政治幕僚，1949年又随蒋去了台湾，他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关系，在其漫长的政治交往中，无论于公或于私，都非同一般。上世纪50年代，雷震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前后整整10年，因其在理念上与国民党权威政治南辕北辙、迥不相侔，

不断发生言论冲突，进而成为统治当局在政治上最强大的敌手。雷震本人也因此遭到政治构陷，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一关就是十年。“雷案”在当时震惊了整个台湾岛，被认为是国民党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件政治冤案。2002年9月4日，“雷案”终获平反，雷震再次成为台湾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尽管这时距先生去世已有23年了。

《自由中国》的创办与1949年前后的时局有关。以胡适的回忆，当年他与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最初是想在上海创办这份杂志，但1949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8月开始溃逃，最后撤至台湾，胡适、雷震等人欲在上海办刊的愿望遂成泡影。雷震是在1949年10月到达台湾的，这时胡适已奉命去了美国。面对国民党的溃败，雷震心情十分低落。他与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会面时，再次谈及创办《自由中国》，杭慨然允诺给予支持。至今健在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经理马之骥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披露杭立武在办刊这件事情上，不仅言辞上对雷有所鼓励，而且“教育部按每月补助三百美金的经费”予以支持，“其不足者由雷震另行筹措”。（《忆雷震当年在〈自由中国〉扮演的角色》）《自由中国》前后出刊260期，总共存活了十年九个月又十天，正好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50年代，这也是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岛后，在政治上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最初十年。虽然当时面临台湾本土政治精英“二二八”事件后噤若寒蝉的不幸局面，但《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湾战后思想史的脉络中，“于无声处听惊雷”——不期然地扮演了一个传播民主思想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时空上来说，或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自由中国》众多办刊人的民主思想理念却前后一贯，最远可追溯到1922年5月，胡适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这是胡适归国后“大谈政治”的起端；1928年3月，胡适、梁

图②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雷震被委任为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政协”的失败，使国共两党复又兵戎相见。

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和“党化教育”；1932年的《独立评论》，更是有着独立思想的社会精英发表



独特见解的场所，胡适为这份刊物呕心沥血，先后写了1309篇文章；而《自由中国》半月刊，则是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完成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理念所追求的一种交待。后人在评价《自由中国》半月刊时说：“这是五四时代培育出来的自由主义者，流散到台湾的最后一个据点。”（魏诚：《〈自由中国〉半月刊内容演变及其政治主张》）

《自由中国》是一本半月刊杂志，逢每月的1号、15号出刊。16开本，大部分时间只有32页。《自由中国》办刊宗旨系胡适先生所写，有四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要向全国国

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从创刊号起，这四条宗旨每期都刊登在杂志上。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创刊10周年，杂志社举办过一次纪念会，有百余人到场，胡适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容忍与自由》的四十多分钟的长篇发言。讲话由杨欣泉记录，后来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十期上。胡适在讲话中透露，1949年4月他离开上海，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前往美国，在赴檀香山途中，凭着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写下四条办刊宗旨，“……雷先生他们都很客气，就用我当初在船上所拟的稿子，没有修改一字”。（《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600页）《自由中国》创刊初期，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雷震任社长，毛子水任编辑部总编辑。编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聪、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艺、胡适、夏道平、殷海光、许冠三、崔书琴、张佛泉、黄中、雷震、戴杜衡、瞿荆洲和罗鸿诏等人。在这些人中，毛子水、张佛泉、崔书琴都是原北大教授，与胡适私交颇深；王聿修是华北大学教授；殷海光自认是“五四后期人物”；杭立武则时任教育部长。创刊前几天，雷震邀请毛子水、崔书琴、张佛泉、王聿修、夏道平等人开过一个座谈会，就创刊具体事宜进行商讨。但在谁做“发行人”这件事上发生了争执。据马之骥先生回忆：“‘北大’一些人，包括王聿修教授等，当时他们认为，雷震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也是国民党里的强人，所以对他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的利用。于是私下计议，确定一原则，就是《自由中国》杂志如能办成功，一定请胡适先生做发行人。”对雷震来说，这实际上也正是他本人的意思。因为在这之前，雷震曾去奉化找过当时“下野”的蒋介石，说好就是“请胡适先生出面领导”的。不过，胡适这时仍滞留美国，短期内不能归。雷震在向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申请登记注册《自由中国》时，特意注明“发行人胡适出国期间，由



图③ 1947年10月，雷震与家人在无锡太湖留影。

社长雷震负一切法律责任”等字句。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正式出刊。1953年12月7日，由台湾“内政部”审核的杂志登记证，即“内警台志字第381号”的批件中，《自由中国》发行人改为雷震，胡适先生这时才算真正卸下了“发行人”的名义。

《自由中国》创刊初期，编委会共有17人，也是人数最多的时期。尽管在其大的理念上基本趋同，但还是呈现出了多元的态势。许冠三先生回忆：“……不管大家如何争辩，若干批评政府



图④ 1949年9月，雷震协助防守厦门的汤恩伯处理政务，图为雷震视察前沿阵地时所摄。

的文稿，不是给改成温吞水，就是整篇见不了天。当争到无词以对时，他（指雷震）总是与毛子水劝我们年轻人莫动火气，须以大局为重。他从不大声说话，只是慢慢地跟大家磨，更不发脾气，几个月下来，我们终于明白，他那‘各党各派之友’的绰号得来绝非偶然。”（许冠三：《做寰先生辞世十一年祭》）以马之驕先生观察的结果，当时编委们大致可分成三种思想路线：“第一是由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为首的‘三民主义’的思路；第三是所谓少壮派的‘唯我主义’的思路。”其中，以“少壮派”最为壮怀激烈，他们认定国民党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由于贪污、腐化、独裁的结果……编委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加上雷震对编辑的职权和制度等考虑不周，也引起过一些不快。杂志社在借用雷震私宅的“外客厅”

作为编务场所时，有读者投稿，雷震见着顺手就拿到自己的书房里拆开看了。副总编王聿修教授不以为然，当面提出过异议。王聿修是最先提出辞职的人。他在向雷震和编委会请辞时，再三说明是受香港方面朋友之邀前去主编《前途》杂志，实属盛情难却。马之骥先生则以为“这看起来是因缘巧合，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也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不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中，编委们的进出离合，并没有影响刊物的正常出版。编委张佛泉先生说：“在筹备期间，我们对雷先生都有戒心，现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地要把《自由中国》办好……”这是《自由中国》创刊一年后，张先生受台中东海大学之聘出任文学学院院长，就任前请马之骥先生在他的泰顺街寓所便餐时所说的一番话。四十多年后，马先生依然记忆犹新。

1949年11月至1951年6月间，《自由中国》与当局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当时杂志“内容着重批评苏俄共产世界政治，没有直接检讨当局的政治。所以，当时的部队都有订阅……”（李筱峰语）到了1951年，国际形势发生诸多变化，尤其是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蒋介石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攻台的可能性不大，便着手对国民党进行内部改造。《自由中国》也将视野由外向内转，开始检讨起台湾的内政，结果触犯了当时的政治禁忌，与当局的关系也从此开始出现了逆转。1951年6月第四卷第十一期，由夏道平执笔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政府金融管制引起情治人员（情报和治安）贪污案件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是《自由中国》创刊以来首次触怒当局，直接导致了军方停止订阅杂志。这篇社论给雷震带来极大压力，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员就闯入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雷震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遂与多位党政要员商讨，他们认为社论所说均为事实，但没有必要发生正面冲突。王世杰建

议再发一篇社论加以平衡，当时主管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陶希圣也是这个意思。《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便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又发了一篇社论，其观点基本回到了与政府金融管制的统一口径上。这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见到这两期刊物后，大为不满。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适书信集》第三册，1208页）胡适是明白人，他了解蒋介石，更了解那个体制。雷震本来在这件事上就有所抵触，他将胡适的信全文刊发在《自由中国》第五卷第五期上，再度引起情治单位的不满。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及陶希圣召集党、军、特要员共9人，对雷震进行当面围剿。彭孟緝甚至诬指雷震有套汇之嫌疑，由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发出传票，雷震拒绝出庭。此事前后整整闹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副总统”陈诚出言奉劝彭等人要“适可而止”，才算告一段落，但《自由中国》从此受到情治单位的长期监视。夏道平先生后来回忆道：“如果没有胡适的信和雷震断然公开那封信的举动，《自由中国》可能在不满两岁的时候，就因《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而被捉人停刊。”（齐墨：《台北拜访夏道平先生所谈所思》）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在台湾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当局不仅在校园内散发反共宣传读物，还要求每个学生背诵“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训”、“总统训词”，其强制做法激起反弹，学生、



图⑤ 1949年底，雷震一家迁至台湾。不久便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同时出长《自由中国》。图为1952年雷震与家人在台北的合影。

家长无不怨声载道。实际上，这是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党化教育”在台湾的一种延续。1954年5月底，余燕人、黄厂风、广长白三位家长投书《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地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自由中国》半月刊，1954年第十一卷第十二期）是否刊发这封读者来信，在《自由中国》内部曾引起过争论。鉴于当时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已经恶化，有不少人不同意刊发此信。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则认为：这封来信不仅反映了台湾教育界的真实现状，还指出了诸如“救国团”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这一事实，进而可进一步检讨国民党的党纪问题。《自由中国》最后就是从这个高度上来刊发此信的。果然，当局大为恼怒，1954年12月，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没有通知雷震本人，而是在《中央日报》上发了一则消息。殷海光从报上得知后，即在1955年1月4日给雷震写了一封很短的信：

傲公先生：欣闻老前辈断尾（指被开除党籍），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雷震秘藏书信选》，第281页）

殷海光的轻松、调侃、幽默，可见此事并没有影响和改变雷震的办刊理念。相反，《自由中国》愈加朝着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方向前行。1956年的“祝寿专号”（《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更是集中火力抨击国民党“一党独大”。这一年10月31日，

蒋介石七十大寿。蒋故作姿态，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纷纷撰文，借祝寿而“进言”。雷震的社论题为《寿总统蒋公》，其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胡适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文章以故事而时论，曲径通幽，巧发奇中，取艾氏比蒋公，劝后者要做到“三无”，即“无智、无能、无为”。也就是说，希望蒋介石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语）。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蒋介石的性格……如此祝寿，搅动人心，酣畅淋漓，连销11版，一时洛阳纸贵。不过，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党、团、军刊物的多方围剿，雷震发表《我们的态度》一文，强调《自由中国》“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今日的问题”大讨论和15篇系列社论，全面检讨了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一，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多数人都在说假话，尤其是当局，以“反攻大陆、国家利益、非常时期……”为政治之口实，掩盖专制的实质；二，《反攻大问题》，必须从公算和透过现实来加以考虑，不能借此来推延台湾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三，反思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务等问题；四，财政问题；五，经济问题；六，美国经济援助的运用和浪费问题；七，小地盘大机构，呼吁压缩并裁减政府机构；八，建立中央政治制度，发挥政治责任；九，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十，立法问题；十一，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十二，青年反共救国团系非法体制，破坏教育正常运作；十三，党化教育应立即停止；十四，《近年的政



图⑥ 胡适虽为《自由中国》发行人，却一直定居美国，实由担任社长的雷震一人主持。1951年，《自由中国》首次因言论问题与当局发生冲突，为求解决，《自由中国》刊载了道歉的文章，胡适为此相当不满，曾来信请辞发行人，后又于1952年的纪念创刊三周年大会上亲自表达辞意，仅录其名于编辑委员之列。不久，雷震正式成为《自由中国》的发行人。

治心理与作风》，对台湾岛的政风败坏提出了严肃批评；十五，《反对党问题》，以此制衡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统治……这些极其敏感的话题，惟《自由中国》在荒芜一片的噤声岁月中，言他人之未敢言，显现出《自由中国》及其同仁的胆识和强烈责任心。尽管某些言论与雷震所提倡的“渐进改革”思路有一点落差，但《自由中国》半月刊从一开始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李敖语），这些肝胆文章得到雷震和编委会的全力支持。1959至1960